

任蜜林 著

汉代内学

——
纬书思想通论

儒道释
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任蜜林 著

汉代内学

——
纬书思想通论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任蜜林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11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978-7-80752-841-8

I. ①汉… II. ①任… III. ①纬书—研究 IV. ①
B22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6786 号

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
HANDAI NEIXUE WEISHU SIXIANG TONGLUN

任蜜林 著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5011398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4.875

字 数 3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841-8

定 价 3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主 编：汤伟侠（执行） 卿希泰（执行） 罗中枢

副主编：唐大潮 李 刚 潘显一 詹石窗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尤汉基	邓锦雄	冯 杰	汤伟奇
汤伟侠	余孝恒	吴景星	李 刚
陈 兵	陈国超	张泽洪	张 钦
罗中枢	周田青	赵志铝	赵耀年
段玉明	段志洪	钦伟刚	卿希泰
唐大潮	翁永汉	郭 武	黄小石
梁赞荣	盖建民	詹石窗	潘显一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由香港圆玄学院资助出版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国家“985”二期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

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编委会主编 卿希泰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新的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

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2005年8月5日于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
研究创新基地、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序

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乃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有许多难题和谜团，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在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演进中，随着认识的飞跃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有许多难题迎刃而解，而有些难题却解决得不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问题反而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其中，包括纬书在内的所谓谶纬或谶纬之学则最为典型。

最早记录谶纬的是《汉书》和《后汉书》。《汉书·李寻传》有“五经六纬”的提法。《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上疏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可见，谶纬或纬书实属一个系统，虽然其名起于汉代，而其实则早于汉代。

至于系统著录纬书目次者，迟至唐代才出现。《隋书·经籍志》著录纬书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并引“说者”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

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讖，以遗来世”。又云：“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从《隋志》著录及汉代文献称引可知，《诗》、《书》、《礼》、《乐》、《易》、《春秋》及《孝经》等，至汉代皆已成纬，即有所谓“七经纬”者。史称“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讖兴”。东汉章帝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讖。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故言五经者，皆凭讖纬以立说。东汉大儒宋均、何休、郑玄之徒，并为讖纬作注，成为一时风尚，讖纬之学甚至成为贯通当时各个文化领域的显学。因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又被称为“秘经”与“内学”。

讖纬之书及其承载的思想学说，自西汉末或两汉之际趋于兴盛，至南朝刘宋及隋又因禁毁而散亡。由于纬书系统几乎是讖、纬、图、候、符、录及星、相等中国神秘文化的总汇，其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文化领域，再加上其语言表达系统多异于正统常规，特别是由于文本的散佚，其原貌、全貌不可复见等原因，使纬书系统成为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最具奥蕴悬疑的思想文化体系和杂芜散乱、难读难懂的古代文献之一。两千多年来，各时代的好学深思之士，都试图以自己的学识心智解开纬书系统的困惑，故其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其中的真知灼见也不可谓少，但似乎并未能完全解开纬书之谜。因为在以往对纬书的研究中，对其起源、流变、作者、时代，乃至篇题、字义、训诂、义理等等，凡有论者，无不存在争议。可以说，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学术史上，对纬书的研究是一项最为复杂、繁难的课题。

纬书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进行研究的难度。除了文献、文

本、文字等方面的难度外，概括起来说，有如下几个既重要又困难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纬书的起源、作者及成书时代问题。从古至今，研究者往往把纬书的思想渊源与纬书文本的形成相混淆。实际上，任何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过程。一部著作的成书或一种思潮的出现，皆有其渊源。但渊源与成书虽有联系又非一事。就纬书的成书来说，虽不能排除其源头性的思想或资料，但也不能因此把源头性的思想资料当作文本形成本身，否则就不能厘定文本的时代。历史上，张衡首倡纬书“成于哀、平之际”，这里显然是指纬书文本形成时间在西汉哀、平之际，而非指纬书的渊源起于哀、平。而后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往往混淆了“成于”与“起于”二者的不同。如清代学者徐养原、汪继培、周治平、金鹗、李富孙、俞正燮等人，皆反对张衡纬书成于哀、平说。其中，金鹗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其说：“纬候之书，说者皆谓起于哀平之世，非也。……其醇者，盖始于孔氏……其驳者，亦起于周末战国之时。”此说言纬书之起源可也，而言纬书之成书则不可也。又如俞正燮在其《癸巳类稿》中说：“纬者，古史书也。……汉人依经录出者，《易》有飞候，《书》有五行，《诗》有五际，皆史氏之旧。孔子定六经，其余文在太史者，后人目之为纬，则百二十国史皆纬也。”俞氏此说，也应是就纬书之起源立论，而非论纬书之成书。如按其“百二十国史皆纬”的说法，无疑不能找出纬书立说的时代性特质。

总之，根据史料，把纬书之成书定于汉代，应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它符合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因此排除对纬书思想渊源的探讨。刘师培在其《骹纬论》中说：“及武皇

践位，表彰六经。方士之流，欲售其术，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讖纬之名。……乃世之论讖纬者，或谓溯源于孔氏，或谓创始于哀、平。吾谓讖纬之言，起源太古。然以经淆纬，始于西京；以纬俪经，基于东汉。”刘氏此说，实际上既批评了纬书“溯源孔氏”说，也批评了纬书“创始于哀、平”说（实则张衡只言“成于”而未言“创始”）。同时他明确地提出“讖纬之言起源太古”，而“以纬解经”或“以纬俪经”则成于两汉。

由以上可知，无论纬书的渊源如何，都不能推翻纬书之成书及纬书思想兴盛于汉代这一基本事实。由此亦可确定：纬书乃汉代特有的时代思潮。

第二，关于纬书产生并兴盛的原因也是纬书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如前所述，纬书虽起源甚早，但其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广泛流行则是在汉代，这一点也几乎成为古今学者的共识。但为什么纬书会在汉代完成其思想体系之建构并发生重大影响，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但都比较多地或侧重于从汉代政治需要出发论证纬书与政权的关系，或侧重于从阴阳五行、数术、方技乃至原始科学、迷信等积习中，寻找纬书产生的原因。上述两个侧重，虽不失为纬书形成的必要原因或条件，但也往往忽视了纬书思潮产生的学术原因或学术思想本身在其发展历程中潜在的、自有的、内在的规律性。

综观中国思想史或学术史，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根据该时期的历史特点所提出的理论思考 and 其所达到的社会治理目标。历史进入汉代，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原有的理论思考和致治目标发生转变，学术思想亦随之而变。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在全面承袭秦帝国的物质与文化遗产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封建大一统的国

家。秦王朝推行的是以法家为指导的思想文化政策，而其统治却仅仅维持了十五年。这一具有强烈震撼性的历史变局，迫使汉初统治者选取了黄老道家为指导思想，并一直坚持了七十年。由于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往往缺少国家典章体制的设计，且在其思想指导方面软性实力有余而硬性实力不足，故而在北方边患的强大压力下，中央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这直接限制了汉代的封建大一统国家走向强盛。汉武帝是一代有为的君主，在他真正握有国家大权之时，便及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遂使具有法家、道家色彩的治国方略，在激烈竞争中先后出局，从而真正结束了春秋战国具有多元性和浓厚人文精神的子学形态，开启了以儒学为主体或主干的经学时代。

所谓经学时代，实质是以夏、商、周三代先王原典为骨干，通过汉代文化精英对原典的解释，以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时代的需要而展开的思想文化的综合运动。而谶纬之学的勃兴，正是这一学术综合运动的产物。其哲学或理论内核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说，以此保证哲学本体的确立，以增加对经典解释的义理性和权威性；二是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的“变义”方法，以此保证对经典解释的广泛性和灵活性。我们从纬书思潮勃兴的历史脉动中，可以窥见上述由子学到经学、再由经学到谶纬的演变轨迹。其中，董仲舒的“天人”、“变义”思想实已成为纬书思潮出现的理论先兆。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看不到纬书的全貌，但仅从大量现存的纬书佚文中，便可看到纬书思想对义理性、权威性（或称合理性）、广泛性和灵活性的热衷和追求。仅从其广泛性或包容性来说，已超越了此前所

有的学说学派。可以说，纬书系统的最后完成，几乎调动了中国文化的全部思想资源，这不仅体现了汉代企图创立强盛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为达到这一致治目标在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突破或排除单一性学说或学派对建立强大的统一帝国在思想理论方面的限制，从而确保汉帝国能够长治久安以达强盛的要求。

第三，纬书研究中再一个重点或难点是关于纬书性质的讨论。关于纬书的性质，近代以来的学者亦多有议论，但往往是掺杂在汉代儒学中加以评说的。因为纬书系统以解释儒家经典为标榜，实已改变了先秦原儒的基本面貌，可以看做是儒学思想的历史变异。因此，与其说谶纬是汉代儒学的一部分，不如说汉代儒学是当时谶纬思潮的一部分。因为从纬书文本所涉及的内容看，其体系庞大，内容繁杂。其中除原儒的一些主要范畴和基本精神外，其对诸子百家，甚至诸子前的思想均有兼容和吸收。因此，就其内容说，实已大大超越了先秦原儒的论述范围。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视纬书系统为杂家的扩大，因为纬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还是坚守着先秦原儒关于仁义的最高学说和王道、德礼、孝亲等基本理论。其所不同者，主要在于纬书系统力图为儒家的社会伦理、王道政治及天人关系等诸项思考，寻找一个更加系统、更加稳定、更加具有权威合理性的理论内核。

纬书所创立的本体模式和宇宙生成模式，在最高层面上的合而为一，便是上述理论内核的主要表现。为了论证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又引以阴阳五行、灾异祥瑞、天人感应、方技、数术乃至往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谶言、隐语、秘笈、儿歌、民谣等等，一股脑儿地皆成为其本体论证的材料。这些材料越积越多，终于

汇成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信仰的一股浓烈而强大的时代思潮。

如何定性这种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有一段对“时代思潮”成因及性质的分析。他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梁氏此论，虽然是对清代学术思潮的分析，但对汉代所出现的“谶纬思潮”来说，却也十分适用。两汉谶纬思潮的表现正是当时儒学企图建立宗教的思想冲动之必然结果。纬书把天理解为至上神，君主则是随天命而生的天子，君主的行为负有天地间祥瑞、灾变的义务和责任。而圣人又是遵循天意进行“托古改制”和为后世立法的素王，如《春秋纬·汉含孳》引孔子的话说：“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圣人和君主都是天命、天意在民间的代表，“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乐纬·动声仪》）。纬书系统对人间的终极关怀，是通过以宗教超越的形式，赋予“天”以人格化的功能来实现的。故其本质属性，乃是从神设的角度阐述儒家经学，体现为对儒家原典的宗教化、神学化理解和诠释。从这一意义上说，汉代的谶纬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已背离了原儒的理性精神和人文取向，用梁启超的话说，“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但纬书系统的

宗教化运动，由于多种原因，最终并未完成自己的任务，故其性质可算做一种准宗教化的思想文化体系。

第四，关于纬书的价值意义及其评价问题，历代学者亦有不同看法。其中，争议甚多，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关于纬书的价值与评价问题，也自然成为纬书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

实际上，对纬书的评价，不仅必然涉及汉代的经学和儒学，也必然涉及社会、人文、古史、神话、民风、民俗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对这样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综合、庞大的思想文化体系，实在是不能给以简单化的处理。但长期以来，有些论者常常把纬书系统看做是幼稚、怪迂、荒诞、迷信、乖道谬典、惑世诬民，乃至唯心、反动等中国文化的反面教材，是“儒学堕落的表现”、“使中国思想退入幼稚阶段”、“使原儒之心性精义不传，而宇宙论之观念，悉属幼稚无稽之猜想，儒学有此一变，没落之势不可救矣”等等。这些评价由纬书牵累到儒学，又由儒学牵累到整个汉代思想，从而认为汉代“是思想混乱的时代”、“是造神运动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的黑暗时代”等等。

与上述议论相反，也有学者高度评价包括纬书在内的汉代思想文化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新阶段”。李泽厚在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这番话，应该说是把秦汉思想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局下考察的结果。因为汉代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极为昌盛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对汉代政治和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的主要意识形态

——经学和儒学进行恰当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从现代学术立场和历史发展角度去考察，纬书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其作用、价值和意义，与整个汉代乃至整个中国早期文化相联系，其对汉代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其内容亦体现为真理与谬误同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统一体，所以在评价问题上，任何极端或过与不及都无法在纬书系统这片茫茫的思想荒原上开垦出学术的绿洲。

纬书号称“难治”，从前所述即可看出，因此，古今学者历来视之为“畏途”。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这部著作，即是作者任蜜林先生不惧纬书文字之诘屈聱牙、难读难懂，亦不惧纬书文本佚文之散乱颠离、难甄难辨，更不畏纬书义理之隐密缭绕、曲折迷奥，经过多番磨砺和呕心沥血，用了近五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大作。通读全书之后，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和优点：一是在广泛收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纬书的源流、作者、形成时代以及篇题、篇目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二是在整个汉代社会、思想背景下对纬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作者认为，纬书之所以能够在汉代形成和兴盛，除了从思想本身来说明外，还应该从社会背景方面予以说明。当时王莽、刘秀及黄巾起义等都曾利用过谶纬，因此，纬书的兴盛与当时统治者的推崇有很大关系。对于纬书的起源，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太古到汉代的各个时期，都有人论述，可谓穷尽了所有可能。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纬书源流进一步考察，认为不应该单一地认定某种思想是其源头，或许许多方面的因素促成其形成。也就是说，纬书的产生可能并不仅是受到某一种思想的影响，或许其产生有多个源

头，也可能与当时整个思想文化背景有关，而秦汉之际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其产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三是作者在了解纬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关于纬书研究的内容和角度虽然很多，但还没有一部对其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此书的目的即在于弥补这一缺憾。作者根据现有资料，对纬书的宇宙观、阴阳五行思想、天人关系思想、礼乐制度、伦理观、历史观、圣人观等问题分别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先从纬书的宇宙观开始，探讨了纬书宇宙观的独特之处；然后分析了纬书的阴阳五行、天人关系、礼乐制度、伦理观、历史观等思想；最后在圣人观中分析了纬书的最终目的——“为汉立法”，即证明汉代统治的合理性。可以说，《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一书，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阐发，均有所体会、有抽发现、有所创新，实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为一家之言者。总的来说，此书史料翔实、态度客观、持论公允、论述中肯、分析深入，是近年来纬书研究中颇具规模和理论深度的力作。仔细阅读此书，不仅可以引导读者进入纬书系统的神秘奥堂，亦可找到能够全面理解汉代思想文化乃至经学、儒学、哲学、神学的一把钥匙。

李中华

2011年7月于北京大学